

# “浮士德精神”

## ——歌德《浮士德》的中国版解读

“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课题组

柏林，2016年8月3日，报告人：谭渊

### 内容提要

歌德并非从一开始就以文豪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中，外交官李凤苞日记中的政治家“果次”、辜鸿铭译著中的“名哲俄特”、王国维论文中振兴国运的诗人形象曾先后出现在中国学人视野中。但歌德对中国影响最大之处还当属带有时代烙印的“浮士德精神”。1922年，革命家张闻天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从《浮士德》中解读出的“永不满足”的行动主义人生观，以此来激励“保守的、苟安的中国人”。三四十年代面对战争威胁和民族危亡，郭沫若、冯至等人强调了浮士德“自强不息”、甘愿为自由和解放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浮士德精神”的内涵又变成了不懈追求真理、重视现实与实践。直至近十年，浮士德的“自强不息”才开始在中国遭到质疑，被重新解读为人类在无尽欲望下催生的悲剧。“浮士德精神”的这种变迁向我们揭示出的是歌德接受史上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化道路”。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  
第一卷《中国百年来的歌德形象：生平、创作、思想、人格》

### 项目目标：

1. 梳理歌德接受史、中国人视野中歌德形象演变过程。
2. 理清中国歌德学的源流轨迹。
3. 梳理歌德学背后的学理。
4. 历史上的因果论证、知识结构、时代精神框架。
5. 补前知、修未来，探讨建立现代的学术精神。

- 1878-1911年间的歌德接受史

### ➤ 李凤苞笔下的“诗伯果次”

根据前辈学者钱钟书、阿英的考证，中国对文化巨人歌德的介绍始于清朝驻德公使李凤苞中的一则日记。李凤苞（1834-1887），字丹崖，崇明人，曾赴英法两国学习，1878年受李鸿章保荐担任驻德公使，后又兼任驻奥、意、荷三国公使，作为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外交官之一，李凤苞驻德期间对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其中不乏振聋发聩的睿见，以至于后来触怒了朝中保守派。作为一位堪称兢兢业业的外交官，他对外交活动的记载更是巨细无遗，其中1878年11月29日（农历），到任不久的李凤苞受美国驻德使馆之邀，参加了美国公使“美耶台勒”的吊唁活动。李凤苞不仅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吊唁的过程，而且认真考证了相关德国人名，“诗伯果次”之名才因此出现在国人视野中：

送美国公使美耶台勒之殡。……美国公法学家汤谟孙诗曰：“美公使台勒君，去年创诗伯果次之会。……（台勒）以诗名，笺注果次诗集，尤脍炙人口。”……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擘，生于乾隆十四年。十五岁入来伯吸士书院，未能卒业。往士他拉白希习律，兼习化学、骨骼学。越三年，考充律师，著《完舍》书。二十三岁，萨孙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编纂昔勒诗以为传奇，又自撰诗词，并传于世。

二十七岁游罗马、昔西里而学益粹。乾隆五十七年与于湘滨之战。旋相外末公，功业颇著。俄王赠以爱力山得宝星，法王赠以大十字宝星。卒于道光十二年。

“果次”就是歌德，“完舍”便是其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李凤苞当年按英语发音进行转译，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轻轻放过有关歌德生平的信息，为我们留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笔”。这位刚刚去世的“美耶台勒”公使是歌德作品翻译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他就是19世纪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游记作家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 1825-1878），同时是歌德名著《浮士德》的英译者，他的译本采用诗歌体，在英语界中享有很高声誉，自1870-1871年首次出版以来，140多年间不断再版。1878年，泰勒接受任命到柏林使馆任职，但抵达德国不久便因病去世。由于泰勒在歌德作品译介方面的杰出贡献，悼词中当然要提到歌德。不过，作为外交官，李凤苞在日记中更为关注的是歌德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因此他重点记录下歌德曾担任魏玛公国首相、获得俄国沙皇勋章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而对其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反而未作更多探究。

分析清末第一代驻外使节的日记不难看出，外交官们将搜集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视为本职工作，与之相对的是，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清朝官员在收集情报时，极少会对欧美的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发展加以关注。因此，虽然李凤苞兢兢业业记录着旅德期间的所见所闻，但他所关注的还是作为政治家的歌德“功业颇著”、“相外末公”等事，对其在文学上的丰功伟绩反倒只有寥寥一行。不难推想：对于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员来说，歌德以弱冠之年、凭诗词文赋闻达于诸侯，又游学于古都、磨练于军旅，最终入阁拜相，寿享遐龄，名播异邦，如此完美的人生履历正印证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人生理想，自然会引起李凤苞的共鸣。而由于文学仅被李大人视为进身之阶，因此歌德显闻于诸侯后的文学成就在他看来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甚至连歌德晚年名著《浮士德》——也是泰勒最有名的译著都成了在政治家歌德履历中不值一提的元素。

#### ➤ 辜鸿铭作品世界中的“名哲俄特”——“德国孔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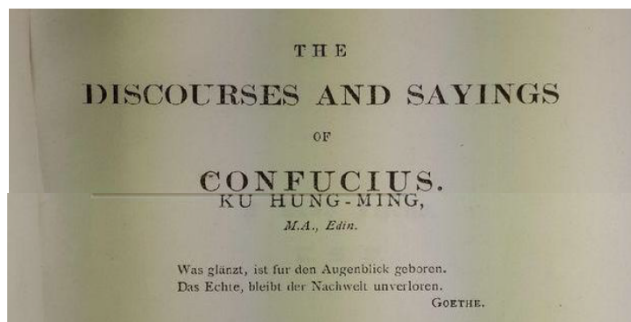
在中国学者中，第一个对歌德有所研究的当属辜鸿铭。他早年随义父到海外学习，在英国读中学时，他就为学好德文而跟随义父背诵了《浮士德》。日后著书立说时，辜鸿铭对其自幼娴熟的歌德语录常常是信手拈来。1885年，学成归来的辜鸿铭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揽入幕府，为“洋务派”推行新政出谋划策。在此期间，辜鸿铭撰写短文《自强不息》，文中引用歌德的作品提出了他对中西文化相通性的理解：“‘唐棣之华，偏其翻尔，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勗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俄特”指的便是歌德，所谓《自强不息箴》直至今日仍被许多学者误认为是来自《浮士德》结尾处天使所唱颂歌：Wer immer strebend sich bemüht, Den können wir erlösen. 其准确出处其实是歌德的短诗《温和的警句》（*Zahme Xenien*），该诗写道：“Besser sollt' es heißen und vollkommner; /So sei denn jeder ein Willkommner. /Wie das Gestirn, /Ohne Hast, /Aber ohne Rast, /Drehe sich jeder /Um die eigne Last.”辜鸿铭的这篇短文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中国的歌德研究、尤其是对《浮士德》的阐释从此就与来自《易经》的“自强不息”结下不解之缘。

《自强不息箴》以及此后一系列引用歌德为佐证的作品反映了辜鸿铭对中西文化相通性的坚定信念。1898年，辜鸿铭将《论语》翻译成英语出版，副标题为“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直译便是“一部引用歌德等作家名言作为诠释的特殊新译本”。该书扉页上

直接就印有歌德《浮士德》中的诗句“Was glänzt, ist für den Augenblick geboren. /Das Echte, bleibt der Nachwelt unverloren.”（译文：“闪亮的东西只能存在一时，真品才会在后世永葆青春。”）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也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辜鸿铭在译文中尽量去掉专有名称，并引用歌德等欧洲著名作家的名言来印证《论语》中的思想，从而拉近欧洲读者与中国经典之间的距离。例如在阐释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时，辜鸿铭就引用表达歌德晚年“断念”思想的诗篇《天福的向往》加以印证。在将“文”与“质”这对概念意译为“art”和“nature”时，他又引用《威廉·迈斯特》中一句“文之所以谓之为文为非质也”作为脚注。辜鸿铭后来发表的重要英语作品如1901年的《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1908年的《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1915年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也都大量出现了对歌德名言警句的引用。

总体看来，歌德在辜鸿铭的作品中始终表现为一位与孔子在思想上有诸多相通之处的“德国孔夫子”形象。后来，辜鸿铭的德国友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民国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勱、唐君毅都曾撰文比较孔子与歌德的相似之处，所谓“自强不息”精神也始终影响着中国的歌德接受史和《浮士德》研究，隐藏在辜鸿铭所塑造的“名哲俄特”形象背后的是学者的比较文化研究思想和寻找文化共通性的努力。



#### ➤ 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与美育典范“大诗人哥台”

在晚清国势颓衰之际筚路蓝缕将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大学者中，王国维的贡献无疑最大。早在1900年夏，他就已经在翻译德国物理学家海耳模霍尔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今译赫尔姆霍茨）的著作时顺带翻译出了其中夹带的《浮士德》诗句，就作品刊行时间而论，这甚至还早于辜鸿铭翻译的《自强不息箴》。此后他还在《教育世界》上专门撰文《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和《格代之家庭》进一步介绍歌德。

王国维1900年译作中涉及歌德著作的一段译文如下：“夫古代人民之开辟记，皆以为世界始于混沌及暗黑者也。梅斐司托翻尔司 Mephistopheles（德国大诗人哥台之著作 Faust 中所假设之魔鬼之名）之诗曰：‘渺矣吾身，支中之支。原始之夜，厥幹在兹。厥幹伊何，曰闇而藏。一支豁然，发其耿光。高严之光，竞于太虚。索其母夜，与其故居。’”<sup>1</sup>

1901年，王国维因病中断留学从日本归来后，开始潜心研究西方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的著作。1904年3月，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第70号上刊登名为《德国文豪格代希

<sup>1</sup> 对应的德语原文为：Ich bin ein Teil des Teils, der anfangs alles war./ Ein Teil der Finsternis, die sich das Licht gearb./

尔列尔合传》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呜呼！活国民之思潮、新邦家之命运者，其文学乎！十八世纪中叶，有二伟人降生于德意志文坛，能使四海之内，千秋之后，想象其丰采，诵读其文章，若万星攒簇，璀璨之光逼射于眼帘，又若众浪搏击，砰訇之声震荡于耳际。”而文章结尾又写道：“嗟嗟！瓦摩尔之山，千载苍苍！莱茵河之水，终古洋洋！惟二子之灵往来其间，与星月争光！胡为乎，文豪不诞生于我东邦！”可见，王国维是从他的教育理想出发，希望文学能够发挥起启蒙人民、振兴国运的作用。王国维在文中着重对比了歌德席勒两人在家庭、人生、成就等多方面的不同，他尤其对歌德的诗歌创作成就赞扬有加：“格代，诗之大者也！如春回大地，冶万象于洪炉。读其诗者，恍见飞仙弄剑，天马脱衔；……格代之诗，诗人之诗也”。有趣的是，王国维虽对歌德诗歌如此推崇，“大诗人”形象在此也呼之欲出，文中却偏偏没有一处细谈歌德的创作生涯，甚至没有举出一篇歌德的作品，反倒是席勒的戏剧《阴谋与恋爱》（今译《阴谋与爱情》）、《彤加洛斯》（今译《唐·卡洛斯》）得以在文中留名。

1904年8月至9月，王国维又在《教育世界》第80、82号发表《格代之家庭》，讨论了家庭教育对歌德的影响，称“格代诗才之敏贍，得自乃母”。歌德之母在文中也被塑造成文学女性形象，例如歌德母亲临终所作之歌被王国维用离骚体译得文采飞扬：“胡仙乐之琅琅兮，导神魂以飞扬！吾将逐遗响而任所之，归我白云之故乡！”王国维在该文中依然没有引用歌德作品，只是提及《海尔曼叙事诗》“即隐述家庭情事者”，而《野蔷薇》、《法斯特》（《浮士德》）也有歌德人生经历的影子，但这都算不上对作品的正面介绍。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连一句歌德诗作都不引用，却又一再撰文对歌德推崇备至，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王国维真的看重作为“大诗人”的歌德吗？

将《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与《格代之家庭》两文结合起来阅读，这一疑问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前一篇文章结尾，王国维曾大发感慨“胡为乎，文豪不诞生于我东邦！”而后一篇文章的开头则隐就是在回答“文豪如何才能诞生”的问题。王国维写道：“此旷世奇才不易得。虽然，苟一观其幼年事，则又未尝不叹家庭教育之功用至宏且远也。”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源于1901年之后对西方哲学、教育学的研究，特别是康德哲学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思想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因此提出了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思想：“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后来，王国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育、美育、德育、体育的“四育”思想，其中“美育”在中国教育界是首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贯穿《格代之家庭》的正是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王国维文中关注了歌德23岁前所受的家庭、学校教育，从中可以看出对歌德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母亲的熏陶、父亲的传授、对个人兴趣的广泛培养和对情操的陶冶，其中对情感的培养即所谓美育又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王国维越是颂扬歌德的伟大，就越是借“大诗人格代”的名气传播自己的美育思想，宣扬他所看重的西方美学教育理念。而歌德的文学作品内容则反而无足轻重了。又如1904年他在《〈红楼梦〉评论》提及“格代”与“法斯特”（《浮士德》），称其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并称“宇宙之大著作”，并说：“在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特》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特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异于彼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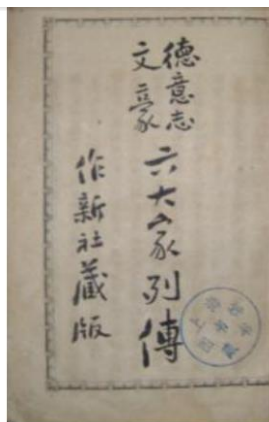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王国维对歌德的兴趣似乎始终只停留在极度的推崇上，而这种推崇又往往是为拔高另一阐述对象以及宣扬自己的美学思想而服务。同时王国维用“索隐法”考证歌德家事，指《海尔曼叙事诗》“即隐述家庭情事者”，背后都有中国红学“索隐派”的影子

### ► 从《独异文坛六大家列传》到“德意志文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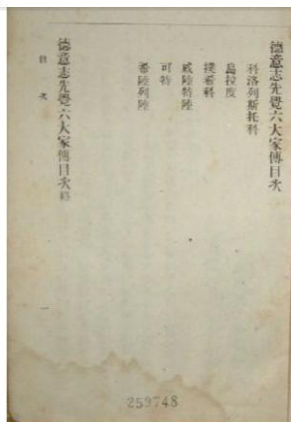
1889年，从德国留学回到日本的著名作家森鸥外发表了当时有“第一名译”美誉的《迷娘之歌》，同年，中井喜太郎从英译本转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1890年，当时还在就读高中的高山樗牛也从英语译出《维特》，并于次年以《淮亭郎之悲哀》之名连载发表，在日本引发了“维特热”。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博文馆于1893年3月出版了《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这也是日本最早系统介绍歌德生平的著作。此书出版于1893年3月。此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已进行了25年，日本朝野上下励精图治，福泽渝吉等人又努力鼓吹“脱亚入欧论”，力图使日本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跻身于西方现代强国之列。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1871年完成统一后迅速崛起的德国就成为日本学习的重要榜样。受此影响，日本编者对所撰写的前言也颇有暗自以德国文学崛起为榜样、为日本崛起张本的意味。前言首先将马丁·路德翻译《圣经》视为“德意志文学之萌芽”，将此后出现的“宗教的社会的之诗歌小说”视为“德意志文学隆盛之第一期”。写到处，文中陡然笔锋一转：“虽然，其时所有之著作，概自他国而翻译之者（法国尤甚），未足以见德意志固有之风俗人情也。”“至于十八世纪，科洛列斯托科、乌拉度、撲希科、威陸特陸、可特、希陸列陸六大家起。乃专致力于斯道。以振兴德国文学为己任。是为德意志文学隆盛之第二期。”日本编者的一些按语细读起来颇有深意，例如书中说“科洛列斯托科氏与乌拉度当全国心醉于法国文学之时。乃共披荆棘闯荒荒。以真挚严格之笔……除狼鄙之法国文学……暗谋德意志文学之独立。”此段文字颇有以德国文学自况，为日本挑战中国宗主国地位张本的味道，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读到此处，难免会联想起千余年来中国文化对日本强大影响。因为历史上的日本是以华为师，文学也是建立在翻译和模仿中国文学的基础之上，直至此书出版前夕，日本才开始决心“脱亚入欧”，意图摆脱“老大之中国”的影响，暗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在这种氛围中，《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的编者采用“春秋笔法”含沙射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文版书影



中译本内封



中译本目录页

中文版《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上海作新社出版，目录页又题为《德意志先觉六大家传》。“文豪”与“先觉”的差别体现了译者和编者对歌德等作家形象在关注角度上的差异。书中的《可特传》堪称中国学界系统介绍歌德及其作品的开山之作。该书首先以史书中“列传”的形式介绍了歌德家庭出身及歌德早期的文学作品。与今天的文学家传记相比，《可特传》未免失之简略，这显然与歌德的作品译介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但该书将歌德的创作生涯与德意志民族文学的振兴结合起来，紧扣“文豪”诞生和崛起的历程，罗列了歌德几乎所有重要作品，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真正树立起“德意志文豪”的形象。

### ► 清末歌德译介小高潮的到来

从1902年到1911年间，马君武、鲁迅、仲遥、苏曼殊也先后投入歌德译介，在留日学者中以及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歌德研究热潮。根据马君武记述，他在1902至1903年留日期间翻译完成了《米丽容歌》，后发表在1914年刊印的《马君武诗稿》中。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其中提到了“瞿提”建“形蜕论”：“瞿提者，德之大诗人也，又邃于哲理，……著《植物形态论》……谓为兰麻克达尔文之先驱”。歌德在这里俨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的形象。此后，鲁迅又在《摩罗诗力说》将歌德誉之为“日尔曼诗宗”，并谈及他所著“传奇”《法斯忒》（《浮士德》）。稍后，仲遥在《学报》1908年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了《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一文，其中概述了歌德的成就：“哥的（Goethe）及西鲁列尔（Schiller Friedrich）两氏同为德意志新派文学之先登大家。德意志文学能称霸于当时全欧者。皆两氏之赐。然两氏之性质。迥不相侔。因之其文学亦立于互反对之地位。哥氏为客观的诗人。其为人有包罗万象之概。故其思想。亦广大浩漫。如大洋之无垠。而其文章。则感与奔流。一泻千里。其所著之最名于世者。曰 Herman und Dorothea 曰 Iphigenia von Tauris 曰 Faust。”从此文中“先登大家”的说法可以看出，《六大家》一书对歌德在中国学者中的接受仍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将歌德席勒视为迥异两极的看法则有王国维前著的影子。1908年，苏曼殊也译出了歌德的诗作《沙恭达伦》（Sakontala, 1791），发表在《文学因缘》。

## ● 1912-1949年间的歌德接受史

➤ 1920年，郭沫若在译《维特》和《浮士德》第一部之前，就明确说过：“我想歌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三叶集》）

➤ 1922革命家张闻天发表《哥德的浮士德》

认为浮士德：“这些满足都是人类向上发展的阶段”，“因为能替别人谋幸福，替别人争自由，所以他快乐了，他满足了”。体现了共产党人“永不满足”的行动主义人生观。张闻天写道：“执着人生，充分地发展人生，我以为就是就是浮士德中包含的根本思想。”结尾再次激励中国人：“唉！保守的、苟安的中国人呵！”

➤ 1932年歌德去世百年纪念活动

1932年的中国时局：2月5日日本占领哈尔滨，1月28日至3月初十九路军抗战。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学者积极从《浮士德》中汲取精神财富。1932年3月22、23日广东上演《浮士德》，邀请函题词：“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做自由和生活的享受。”（Nur der verdient sich Freiheit wie das Leben, Der täglich sie erobern muß.）“the Faustian idea, the feature of unresting effort and incessant struggle, the eternal longing for perfection, the intensive desire for productive effort, for the blessing of mankind and at last the redemption in a metaphysical world in spite of earthly implications in faults and errors, is the deepest and the most extensive expression of German spirit and being.”（“浮士德思想乃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始终如一地斗争，永远渴望尽善尽美，衷心企盼创造力；尽管会受到谬误与错误的世俗影响，仍企盼人类福祉以及形而上世界的最终救赎。总之，浮士德思想是德国精神与存在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表述。”）

1932年还问世了三部重要著作：张月超著《歌德评传》；陈淡如编《歌德论》；宗白华编《歌德之认识》（《歌德研究》）。重要趋势：积极评价歌德，尊崇其文学成就，但受红学“索隐法”影响，把歌德等同于维特和浮士德。

➤ 张月超：《歌德评传》

“浮士德受了糜非斯特一时的引诱，走入多少的歧途，犯了多少的错，纯洁的格莱德馨因他而惨死在狱里，这罪过诚然使他感觉到了最沉痛的悔疚，可是，因为他仍要努力于“最高生命”的完成，不久又有了新生。最后他终得解救，解救并不在他对于生活有何完成，而就是在他的生活中不断的前进与追求。因此他的每一段生活在全体上发生了一种价值。”

➤ 宗白华编《歌德之认识》

宗白华编《歌德之认识》中的多篇论文深入分析了歌德的作品、人生，也体现了这一代中国学人努力从外国文学中汲取养料，“文化救国”的思想。

但其中也有削足适履之作，如书中收入贺麟著《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写道：“歌德见战事爆发，明知于德不利，但亦无可如何，当时魏玛公爵幕府中人，皆莫不各顾性命，走避一空。惟歌德仍镇静不动，处之泰然。……综观歌德身当此次国家大难时前前后后，我们知道他事先于战与和双方均预有主见，虽因格愈情势，未能见诸实行，但他以一文人地位而能出此，总可算得谋国以忠了。及眼见大难当前，别人莫不奔避逃命，而他以一参议的闲职，乃能镇静以待，无所恐惧，为本地维持幸福……”完全回避歌德对拿破仑的好感、会面、逃避拿破仑失败现实等史实，刻意塑造一个国难关头临危不惧的歌德，归根结底还是在为国难当头的中国人提供榜样力量。

➤ 冯至 1939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将《浮士德》看作是“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的一生，自言从书中得到“不少精神的支持”。

➤ 陈铨：《浮士德的精神》（1942）总结了歌德笔下“浮士德的精神”：

“第一：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对于世界人生永远不满意的人。世界的进步，是无穷的，人生的意义，是要永远找寻的。……第二：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不断努力奋斗的人。生活的意义，不在努力奋斗的结果，而在努力奋斗的过程。……第三：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一个人要作事，就得不怕事。……第四：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有激烈感情的人。……第五：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与身处重庆陪都、忧心民族存亡的陈铨自己的“战国策”主张吻合：“中国数千年以来，贤人哲士，都教我们乐天安命，知足不辱，退后一步自然宽。对于世界人生不满意，认为是自寻烦恼，这一种不积极的精神，在从前闭关自守的农业社会，外无强邻，还有相当的价值，处在现在生存竞争的时代，不改变这种态度，前途就很暗淡了。至于奋斗努力，不顾一切，也是中国的理想，然却是目前最需要的精神。感情方面，中国人素来就在重重压迫之下，不能发达，浪漫主义者无限的追求，更同我们静观的哲学，根本冲突。然而没有感情的冲动，没有无限的要求，中华民族，怎样还可在这一个战国的时代，演出伟大光荣的一幕。”

因此，他在结语中写道：“总起来说，浮士德的精神是动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静的，浮士德的精神是前进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保守的，假如中国人不采取这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地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在歌德浮士德的结尾，浮士德被救了，天使们把浮士德的灵魂欢迎到天上去了。中国人还想不想得救呢？会不会受天使的欢迎呢？这就要看我们以后的态度了。”

● 1949-1976年间的接受

➤ 受东德影响：瓦特·乌尔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定的调子“如果你们想知道前进的道路通往何方，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吧！”“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着自由的人民”也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 恩格斯影响：“在他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因此，他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

➤ 郭沫若在《〈浮士德〉简论》中将《浮士德》解读为歌德晚年“人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歌德从早年的个性主义向利群主义的转变……它最后一幕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有许多理想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要求的”。

➤ 冯至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所编《德国文学简史》将《浮士德》概括总结为“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顶峰”。

#### ● 1977年以来的接受

➤ 从更广阔的解放全人类意义来解读浮士德。1980年，范大灿《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启蒙后的人是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他是有希望的还是没有希望的”，浮士德被救赎的命运，说明歌德对人类前景充满信念。受其影响：《乐观的哲学——从〈浮士德〉谈歌德的哲学思想》（简明）认为浮士德“对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永不停息的探索”，是“人类得以不断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是整个人类的象征”。

➤ 杨武能从人道主义来进行解读。他的《〈浮士德〉面面观》认为浮士德就是歌德本人、具有德国人严肃深沉彻底的特征、浮士德是近代西方文化 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象征、是“人类杰出的代表”，“肯定人生、人性、人欲的浮士德精神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先进世界观”。《何只“自强不息”——浮士德精神的反思》中进一步扩大了“浮士德精神”为“自强不息”之外还有“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人的神性——高贵，善良和乐于助人”。

➤ 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1987)：提出浮士德精神、《浮士德》与歌德的精神和思想关系；

➤ 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1999)：将歌德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史加以对比，力图说明《浮士德》是“歌德的精神自传”。

➤ 绿原论《浮士德》(1994)的意义和价值：“不断前进的道路本身才是人生的目标”，“人类最高的成就乃是一种高尚的奋斗，一种永远自强不息的创造性的生活”。

➤ 近年的批判之声、反启蒙的思路

吴建广先后发表《人类的界限——歌德《浮士德》“天上序曲”诠释》、《濒死意念作为戏剧空间——歌德浮士德“殡葬”之诠释》“反启蒙式”解读：浮士德因为“认识欲、淫欲、虚拟欲、僭越欲、创世欲”而罪孽深重，最后的救赎场面是浮士德临死产生的幻觉即“濒死意念”。也就是说，浮士德的灵魂并没有获得天使的拯救。

#### ● 德国人如何理解 das Faustische

Thea Dorn 在《Die deutsche Seele》(德意志之魂)中将《浮士德》与德国人对“工作”的认识结合起来，她写道：“在《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n Divan)中，歌德说：“工作着，时日短，若彷徨， 时日长。”艾克曼曾指责大师抵抗拿破仑战争期间没有为国效力，歌德回答说：“每个人遵天命行事。当我行之事我不分昼夜，刻不曾停，尽我所能，毫不懈怠。若他人个个如我，天下太平焉。”无止境的好奇把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交到了魔鬼手中，但正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工作保护他免入地狱。“不停追求与努力的人，将得救赎。”《浮士德 II》结尾，天使唱着这样的歌将浮士德接入天堂。”

在她看来，Das Faustische 就是在“永不满足”的积极工作状态中得到满足。